



探究经济变迁

何伟福自选集

何伟福 著

Economic
Changes
Explor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探究经济变迁

何伟福自选集

何伟福 著

Economic
Changes
Explor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究经济变迁：何伟福自选集/何伟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434 - 8

I. ①探… II. ①何… III. ①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研究—中国 ②经济史—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814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晓红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89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西南地区经济史研究”，讨论了清代贵州制度变迁的动因及特征，侧重考察了清代滇黔地区的商人、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比较研究了当代西南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研究”，论述了革命根据地合作社与合作社股票的互动关系。第三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变革与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研究”，透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揭示了经济行为与社会建构的内在联系，论述了科学发展对于社会建构的重大价值。

“马克思主义理论”
(015116号)资助成果





何伟福，湖南道县人。博士后，贵州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贵州省科学社会主义暨政治学学会副会长，贵州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2006年12月—2007年5月在美国加州大学富乐敦分校做高级访问学者，2007年6月—2010年10月在厦门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贵州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各1项，参与研究省部级课题6项；在《思想战线》、《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已出版专著3部；1项成果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责任编辑：刘晓红

封面设计：大疆设计
10-01574849

2015年度贵州省省级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
(合同编号：黔学位合字ZDXK[2015]16号)资助成果

目 录

西南地区经济史研究

清代滇黔地区的内地商人与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	3
清代贵州境内的外省商贾	14
清代贵州市场初探	24
清代贵州制度变迁的动因、特征及其与财政经济的 关系述论	35
清代云南经济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47
清代贵州矿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57
云南与西南五省（市、区）外贸发展比较研究	64
云南装备制造业振兴路径探析	76
提升贵州外贸国际竞争力的对策研究	87
关于全球化背景下贵州对外贸易发展的思考	96
西南五省（市、区）外贸发展比较研究	104
贵州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	114
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贵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20

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研究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借谷票述论	133
抗日根据地合作社述论	153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粮食合作社及股票初探	170

2 | 目 录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消费合作社的股票发行及作用	176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粮食调剂局述论	182
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与党的群众路线	19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及 绩效研究	201

中国传统社会变革与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211
唐代农民的身份地位变迁	230
历史上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转型	241
《明实录》所见天津及附近地区水利营田探析	248
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与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	256
刘铭传的商务思想及其在台湾的实践	270
经济行为与社会建构：科学发展观的新经济社会学视角	279
威茨曼分享制经济评述	288

西南地区经济史研究

清代滇黔地区的内地商人与市场 网络体系的形成*

一 内地商人在滇黔地区的兴起与构成

(一) 内地商人在滇黔地区兴起的主要原因

清代，内地商人在滇黔地区的兴起是政治、经济等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变迁的结果。由于制度环境、制度变迁，使清代滇黔地区交通得到极大改善，交通网络化并嵌入全国交通网络之中；滇黔地区的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内地商人纷纷进入这一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首先，由于政治、军事的需要，促使滇黔地区驿道、航道开通，交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内地商人在云贵地区的贸易活动创造了必要的交通条件。由于滇黔地区特别是贵州，对王朝中央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历代统治者都特别重视对这一地区交通的开发与治理。明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加强对西南各省的统治，特别着眼于云南的开发和边防的巩固，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整治、修建贵州的驿道。至清代，为了加强和巩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在明代驿道的基础上，对湘黔、黔桂、滇黔、川黔等几条主要驿道进行“改驿设铺”，同时“新修驿道”至古州、清江、台拱等“苗疆”地区。除东西干道黔湘、黔滇两条干线设

* 本文发表于《思想战线》2007年第6期。

置驿站外，其余各驿道上原设的驿站一律裁撤，改设递铺。

省际之间的干道为“官马大路”。清代在贵州修建的“官马大路”主要有东西干道和南北干道两种：东西干道即湘黔、滇黔驿道。这一干道贯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四省，而达于云南省城之商路。这是长江中下游各省进入滇黔，也是滇黔入京的主要驿道。沿途经过的主要城市有昆明、马龙、曲靖、沾益、平彝、普安、安顺、贵阳、镇远、辰州、常德、岳阳，从岳阳可直达汉口。南北干道即黔川、黔桂干道，主要有4条：一是贵州至四川干道，由贵阳经修文、息烽、遵义、桐梓北入四川。二是贵阳至广西干道，由贵阳至平越间龙里、新添、平越，从平越向南经独山州、荔波县达广西庆远府。三是遵义经仁怀至合江水陆运道。该驿道至仁怀转水运，顺赤水河而下至四川合江、重庆。清末改驿道路线，由遵义经八里水、鸭子口、枫香坝至仁怀，为川盐销黔的重要线路。四是乌撒（即威宁）经赤水河、叙永，至四川泸州驿道。清廷曾利用这条驿道从贵州运出铜铅，经泸州转运入京。

除了上述省际大道外，清代贵州省内通往各府、厅、州、县乃至偏远山区的道路也相继开通。

云南地区。清政府对云南通往周边国家及西藏、四川的驿道干线进行了修整。

滇缅干道，自大理经下关、永平、腾越、南甸、曼允入缅甸至八莫。这是缅棉入滇、黄丝出口的一条重要商路，很早就是我国南方的一条“丝绸之路”。云南南部与缅甸、老挝接壤，从思茅的不同口岸可入缅甸、老挝两国，这是云南通往缅老泰的又一重要通道和商路。

川黔滇驿道，是四川与云南、贵州交通的捷径。从滇入川，主要由昆明经嵩明、寻甸、东川、昭通、大关，在老鸦滩出境，然后沿水路到达四川的叙州。供京师铸币所需“滇铜”的外运，以及云南与长江中下游各省贸易多取此道。此外，还有泸州大路，即从云南曲靖向北行，经宣威、威宁、毕节进入四川省，过叙永、纳溪，渡长江达泸州。

滇藏驿道，从大理经维西、中甸、永宁可到达川藏路上的巴塘或

里塘、打箭炉；或由大理经丽江、中甸、阿墩子，至江卡而入西藏。

除了开通和整治陆路交通外，清王朝对云贵地区的几条重要的航道分别进行了多次疏通和整治，使滇黔地区与周边省区的水路交通更为便捷。赤水河是川黔之间一重要水道，是贵州西北的主要水运干线。乾隆十年，赤水河航线开通，在运铅和运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赤水河运川盐入黔每年多达1300多万斤。^①

连接黔湘的主要水道清水江，发源于都匀县邦水乡郎里，中经丹寨、麻江、凯里、黄平、台江、施秉、剑河、锦屏、天柱、至湖南黔阳入沅江，在黔省境内长约千余里。清水江暗礁险滩较多，水流偏急，航行不利。雍正八年，经过地方政府整治，清水江通航工程竣工，楚米运黔，木材及其他山货外运湘楚达东南诸省，都须经过这条水道。“又自旧施秉县以上三百八十里，而黔粤一水相通，帆樯接踵”。^②

黔桂间有重要水道都柳江，是贵州南部的重要水道；贵州木材经此大量运往广西柳州集散，称为“柳木”。通过都柳江输出最多的是木材，输入为日常生活用品。

雍正七年（1729），地方政府修通了以南盘江为主干的水陆交通干线。该交通干线连接滇黔两省，可达粤闽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乾隆六年，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云南、注入四川的金沙江滇川段航道疏通，打通了滇蜀两省的水上通道。滇省北上外运铜矿，可沿江直达川东。

总之，湘黔、黔桂、滇黔、川黔、川滇、滇藏、滇缅老（挝）泰等驿道干线的开设修整，滇黔两省以贵阳、昆明为中心通往各府、厅、州、县的大道和几条重要航道的开通，使清代滇黔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尽管发展交通的目的主要是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便于军事控制。例如，清廷平定水西，平定吴三桂叛

① 林辛：《贵州近代交通史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② 任可澄、杨恩元：民国《贵州通志》三《前事志》：“张广泗请开下游通楚粤河道”，贵州文通书局铅印本，民国三十七年。

乱，镇压石柳邓、王仙起义及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都是通过延伸到各府、厅、州、县乃至一些偏远山乡的大道或驿道迅速调动军队而完成的。水陆交通网络是清王朝的重要命脉，关系着调兵遣将、行军作战、运输粮秣、传送情报等政治、军事功能。如果没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系统，使清王朝的军队在短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它所要到的地方，仅仅依靠边防要塞和地方治安，对云贵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几乎是无法维持的。然而，这个起初用于政治、军事目的的水陆交通系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并深深地“嵌入”全国的交通网络之中，使云贵地区成为全国交通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适应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有利于对贵州，甚至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云贵地区的开发环境，客观上密切了滇黔地区与周边国家、省区及省内各地的联系，打破了滇黔地区的封闭状态，使滇黔地区与缅甸、老挝、泰国等周边国家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连为一体。云贵地区成为全国交通网络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滇黔内部各地之间、滇黔地区与内地及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商业贸易发展起来，内地商人纷纷进入滇黔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二）清代滇黔地区内地商人的地域构成

清代，在滇黔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有江西、湖广、浙江、两广、四川、山陕、福建、安徽等地的商人，其中以江西、湖广商人最多。江西商人在滇黔地区无论其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均超过其他各省。谢圣纶在《滇黔志略》卷17中说：“滇黔各处，无论通衢僻村，必有江西人从中开张店铺或往来贸贩。”道光《贵阳府志》卷29称：“会城百工骈集，然皆来自他省……商贾则江西、湖南人为多。”

湖广商人。即湖南、湖北商人。在贵阳，不少湖广商人长期经商，后置产成家，渐成土著。如镇远，“居民皆江楚流寓，湖南客半之”。^① 在云南也有类似情况。据道光《昆明县志》卷2记载，在昆

^① 蔡宗建等：乾隆《镇远府志》卷9《风俗志》，贵州省图书馆复制（1965）油印本。

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在昆明德胜桥外还修建了湖南商人会馆。

两广商人。两广毗邻滇黔，有不少商人进入滇黔两省经商。如贵州兴仁，“清嘉庆以来，多鄂、粤商人贩运洋棉、湖棉至县出售”；^①“新疆六厅”开设之后，两广商人纷纷进入从事各种商贸活动。^②大理府邓川州，“商贾并集，近则滇西州县人士，远则川、广估客亦多至者”^③，肯定不乏两广商人的活动。

四川商人。清代，进入滇黔活动的川商日盛。如松桃厅，乾隆年间有不少川商活动，“城市乡场，蜀、楚、江西商民居多，年久便为土著”。^④思南，“为川贵商贾贸易之咽喉”。贵州其他各地，到处都有川商的活动，尤以黔北为盛。云南也是川商活动的重要场所，其“足迹殆遍滇之迤西州县村间”。^⑤

山西、陕西商人。又称秦晋商人、山陕商人，是全国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帮，滇黔地区也有他们的足迹。史称：云南蒙自居民，“楚居其七，江西居三，山陕次之，别省又次之”^⑥，山陕商人当为数不少。在贵州仁怀茅台镇，山陕商贾积巨资经销川盐，有的因此成为巨富；清末，山陕商贾在思南设有十大盐号，“商之由陕由江至者，边引蜀盐，陕人主之”^⑦，说明山陕商人在贵州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福建商人。闽商在滇黔的商业活动也引人注目。如兴义府，“商多江西、闽、粤、蜀之人”。福建商人在贵州许多地方都建有天后宫（福建会馆），有的地方甚至有数座天后宫，说明福建商人的足迹遍布全贵州。在云南活动的福建商人也不少，如福建永定县商人，“远贩

① 葛天乙等：民国《兴仁县补志》卷14《食货志》，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油印本，1966。

② 贵州通史编纂委员会：《贵州通史》卷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③ 林文勋：《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④ 爱必达、张凤笙等：《黔南识略》卷20，清道光二十七年罗绕典刻本。

⑤ 郑少成等：民国《西昌县志》卷2《产业》，民国三十一年排印本。

⑥ 康熙《蒙自县志》卷2。

⑦ 萧官、何廷熙：道光《思南府续志》卷2《风俗》，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油印本，1966。

吴、楚、滇、蜀”。^①

徽商和浙江商人。如徽州商人曾涉足滇、黔。宁国府商人亦“远入滇、黔间”。在贵州黎平府的木材交易商中有“三帮”、“五襄”之分，“三帮”就是来自安徽、江西、陕西三省的木商。活跃在滇黔地区的浙江商人中，以龙游商人为甚，“贾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毗邻，俗有遍地龙游之谚”。^②

二 内地商人在滇黔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与市场网络的形成

（一）内地商人在滇黔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

清代，活动在滇黔境内的内地商人经营的商品主要是：（1）从外地输入滇黔地区的商品，主要有盐、粮食、棉花、棉纱、布匹、日用百货类商品。（2）从滇黔地区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鸦片、木材，以及包括铜、汞、银、铅等在内的矿产品，桐油、木油、灯草及土布类土特山货等。下面以内地商人在滇黔地区经营的矿产品、棉织品、丝织品为例说明之。

（1）矿产品。内地商人在滇黔地区主要开采、经营铜、汞、银等矿产品。这些商贾往往集矿主与行商于一身，开矿、贩运贸易并行开展。在云南，“从前开办（铜矿）皆系川、湖、江、广大商巨贾”。^③“查办厂务，全在资本厚实，从前厂利丰旺，皆由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厚积资本，来滇开采经营”。^④江西帮和湖南帮商人入滇经营矿业，输出矿产品，并负责驮运每年入贡的1200万斤滇铜。

在贵州，铜仁府万山、普安州回龙湾汞矿区、开州白马洞两流泉是当时全国的主要水银产区和省外汞商收购水银贩运外地的重要市

① 道光《永宁县志》卷16《风俗》。

② 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乾隆六年增刻本。

③ 唐炯：《筹议云南矿务疏》，载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7，光绪二十三年刊本。

④ 王文韶等：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45《厂员》，光绪二十七年刊本。

场。如两流泉，“为川黔湘古道交叉点”，“汞商则十之八九皆江西两湖人，富商大贾，终岁云集。汞的交易额每场在三百担以上”。^①

(2) 棉织品、丝织品。在滇黔地区经营棉、丝织品的内地商人亦不少。在云南，如“四川帮之丝绸、玻璃、烟叶等，其世业有相沿迄今者”。^② 内地商人建立了布行、绸缎行等行业会馆，并制定相应行规。昆明的绸缎行规定：外省各商帮来滇销售绸缎，市价一律不得忽高忽低，滥销滥卖；客货定价之后必须照价而沽，等等。

在贵州，也有不少内地商人经营棉、丝织品。如安顺，道光年间城内共有3个棉花市场、1个土布市场，经营绸布的外省商号有80多家。铜仁府，其汉民“多来自江西，抱布贸丝，游历苗寨”。思南府，为黔东北贸易重镇，“棉花、布匹江人主之”。遵义是滇黔地区丝织业的生产和贸易中心，桐梓，是滇黔地区又一重要产绸基地，贵州其他地区，如正安、绥阳、仁怀、赤水、湄潭、黔西、定番等地丝绸业亦颇为繁盛，“售丝售绸，远通商贾”，内地商人在这些地方相当活跃。

(二) 清代滇黔地区市场网络的形成

内地商人的上述活动，对清代滇黔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雍正四年十月，鄂尔泰奏称：“滇黔远居天末，必须商贾流通，地方庶有生色。”^③ 道光年间，贵州巡抚贺长龄在其奏疏中说：“黔不产盐，布匹又贵，类皆挹注于他省。苗民错居岩洞，所饶者杂粮材木耳，非得客民与之交易，则盐布无所资，即杂粮材木亦无由销售，分余利以供日用。是客民未尝不有益于苗民。”清代内地商人对滇黔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商贸活动直接推动这一区域城乡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就市场层次而言，这一时期滇黔地区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可分为区域中心市场、中等商业城

① 龙云等：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一》，铅印本，1948，第311—315页。

②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14《商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任可澄、杨恩元：《民国贵州通志》三《前事志》：“鄂尔泰陈奏两省事”，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民国三十七年。